

北大新闻学茶座精编 1

李杰琼 李松蕾 编

“北大新闻学茶座”是由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联合主办，卓南生教授主持的小型学术沙龙，以激发问题意识，启迪研究思路，开阔学科视野。众多海内外知名学者和业界资深专家先后光临“茶座”主讲，与从事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尤其是新闻传播史论研究）的中青年研究者、青年学子互动交流。

本书收录了“茶座”开办五年来聚焦新闻传播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的14篇讲稿，内容包括三个部分：“新闻传播史论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检视与探讨”“当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实践与反思”。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

6

北大新闻学茶座精编 1

李杰琼 李松蕾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新闻学茶座精编. 1 / 李杰琼, 李松蕾编.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

ISBN 978-7-302-41891-7

I. ①北… II. ①李… ②李 III. ①新闻学-文集 IV. ①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2020号

责任编辑: 李莹

封面设计: 郭宏观

责任校对: 王荣静

责任印制: 沈露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者: 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0mm×230mm 印 张: 14.25 字 数: 176千字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产品编号: 064201-01

总 序

〔新加坡〕

卓南生²

程曼丽¹

经过一番甄选与琢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它既是学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集萃,也是吾辈向创会前辈敬献的一份厚礼。

历史上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由时任校长蔡元培亲自发起并担任会长,他同时聘请留美研习新闻学归国的徐宝璜、《京报》社长邵飘萍担任研究会的导师,这三人也因此被称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三驾马车。

蔡元培校长亲自起草研究会章程,确立研究会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学会拟定的章程、宗旨,学会开设的课程,出版的刊物、教材,成为中国新闻学科建设最初的范本,也使北京大学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摇篮。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很多是当时的进步学生,其中的一些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有一些成为著名的新闻人。据史料记载,在获得证书的55人中,就有毛泽东、

1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2 卓南生,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兼副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罗章龙等人的名字。这段往事已经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2008年4月15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按照惯例，许智宏校长任会长，并聘请首批10位海内外学者担任研究会导师。《光明日报》用整版篇幅介绍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及恢复成立的情况；人民网对导师聘任仪式进行了全程直播报道。

恢复成立后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力求开拓进取，创造新的业绩。

复会以来，研究会连续举办了五届年会，主题分别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暨五四时期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东亚新闻学与新闻事业的回顾与反思”“新闻史论教育与研究面临的难题与困惑”“如何研究新闻史如何弘扬学术精神——以《新闻春秋》公开发行为契机”和“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与主体性的再思考”。

复会以来，研究会传承历史，连续举办了五届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截至2013年，毕业学员达到100名。学员来自国内三个新闻机构、一所海外大学和64所国内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湖南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等。2011年，特训班学员自行成立了同窗会，2012年和2014年又相继成立了两湖分会和东北分会。

复会以来，研究会与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40多次北大新闻学茶座。光临茶座的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学者和业界人士。茶座讲座的部分内容刊登在《国际新闻界》《世界知识》《参考消息》《新闻春秋》、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和财团法人卓越新闻基金奖的

网站上。近年来，北大新闻学茶座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学子，形成了一个跨国、跨界、跨校、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

复会以来，研究会出版《北大新闻学通讯》14期，并且开设了专门的网站（<http://ioj.pku.edu.cn>）和专门的公共邮箱（iojpku@126.com）。

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基礎上，2013年7月，学会成员首次走出国门，与韩国言论学会联合举办有关两国媒介产业发展的研讨会，搭建起了中韩两国学者可持续交流的平台。

2013年11月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支持下，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举办了“十年再出发——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创新论坛”，各部委十数位新闻发言人与会并围绕如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人民网、中国网全程直播，《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作了大篇幅的报道。论坛文集《十年——新闻发言人面对面》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复会以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在海内外新闻传播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之际，新闻学著名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方汉奇先生对于北大的新闻学教学、研究作出这样的评价：“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了。她在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方面拥有四个全国第一，加上站在她背后的北大的声望和影响，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已经后来居上，跻身于中国新闻教育的第一团队。希望她脱颖而出，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发展继续努力，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参见方汉奇教授2011年5月29日的微博）2013年12月21日，在纪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5周年、复会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方汉奇教授作为学会成长的见证者，在发言中强调：“从复会到现在，会员们对新闻理论与实践中的众多问题进行了

研究和探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复会后五年的工作已经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期待她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是研究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全面展示。它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经典新闻学著作的再版，研究会导师的研究成果，特训班学员的优秀成果以及研究会学术活动集萃。我们的初衷和心愿是：通过“文库”的出版，贯通“古今”，延续血脉，传承薪火，砥砺前行，让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对吾辈而言，这亦是一份历史责任。

2014年10月14日

复会六周年纪念

目 录

第一部分 新闻传播史论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1
方汉奇 卓南生 程曼丽 王润泽	
如何研究新闻史? 怎样办好《新闻春秋》?	3
程曼丽 《〈蜜蜂华报〉研究》的写作过程及其引发的思考	20
卓南生 从中日近代化报刊起点与演变之异同看	
东亚新闻事业	34
卓南生 新闻史研究方法论之再思考——从《香港华字日报》	
大量原件之发掘谈起	44
吴廷俊 多元媒介群落不均衡生长——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媒	
体生长状态考	55
第二部分 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检视与探讨	65
汪 琪 治学? 研究? ——回到两千年前找寻出师的路径	67
李 彬 学术何为, 前沿安在——对当下新闻传播学	
的若干反思	86
孙旭培 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失范与规范	102
郝晓鸣 《亚洲传播学报》与亚洲传播研究:	
本土研究的国际化	127
苏钥机 探究新闻的本质	140

第三部分 当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实践与反思	161
阮次山 专访国际政要的苦与乐	163
林洸耀 西方主流媒体如何报道中国	174
林任君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发展历程	186
梁丽娟 《苹果日报》对港台传媒及社会的冲击	196
后 记	216

第一部分

新闻传播史论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如何研究新闻史？怎样办好《新闻春秋》？¹

方汉奇 卓南生 程曼丽 王润泽

卓南生（以下简称卓）：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内部机关刊物《新闻春秋》新近获得了中国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刊号为CN10-1063/G2），成为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以此为契机，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北大华媒研究中心）和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合主办“北大新闻学茶座”第20次学术活动，特邀方汉奇教授和大家谈一谈“如何研究新闻史？怎样办好《新闻春秋》？”今天的茶座由北大华媒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教授主持。接下来请程教授致辞并主持。

程曼丽（以下简称程）：谢谢卓老师。欢迎各位老师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来到北大，未名湖畔的景色一天一个样儿；会后如果大家有时间，可

1 本文根据“北大新闻学茶座”第20次活动（2012年3月31日）的主要内容整理。本次活动采取座谈形式，出席者以中国新闻史学会在京常务理事、特邀理事和北大新闻学茶座的基本成员为主。因篇幅所限，中间研讨环节内容省略。

以去那里走一走。此次活动由两个单位联合主办，分别是北大华媒研究中心和中国新闻史学会，卓老师是华媒研究中心的学术主任，也是史学会的名誉顾问。因此，有两部分朋友出席此次会议：一部分是出席北大新闻学茶座的常客，另一部分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常务理事和特邀理事。当然，这两部分朋友其实有着一定程度的重合。今天我们还特别请到史学会的创会会长，也是现在学会的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再次对各位朋友的参会表示热烈地欢迎和由衷地感谢。

最近史学会迎来一个好消息，即会刊《新闻春秋》由内部刊物转为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这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史学会先前与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签署了一项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出版《新闻春秋》纸刊和电子刊，通过呈现高质量的学术内容来向出版署申报正式刊号。《新闻春秋》主编王润泽老师负责与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协调，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向王老师表示感谢。《新闻春秋》已经获得正式刊号，下一步如何办好、办大、办强这一刊物，是史学会面临的重要任务。同时，北大华媒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卓老师的指导下，一直致力于新闻史论研究、师资培训和学术活动的开展，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今天会议的议程是：首先请方汉奇教授和大家谈谈“如何研究新闻史？怎样办好《新闻春秋》”这个问题，接着请王润泽老师介绍刊物的现况、办刊设想和今后努力的方向，然后请大家围绕茶座主题自由谈。最后请卓老师作总结发言，介绍华媒研究中心和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在新闻史论研究和学术活动开展方面的经验和心得。下面，欢迎方汉奇先生讲话。

方汉奇：我这些年因为岁数大了，课不讲了，文章也写不了了，教学活动和学术会议也很少参加了。这次来，原想只是就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刊《新闻春秋》获得正式刊号的事，和大家一起庆祝一下，交流一下，

没想到被拉到“北大新闻学茶座”里来,要我作个发言。我没有什么准备,(程)曼丽教授和卓(南生)先生给我出了个题目是“如何研究新闻史?怎样办好《新闻春秋》?”对此,我也没有想好。但既然是茶座,那就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作个回顾,和大家随便聊聊。

我开始教新闻史是1951年,当时只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新闻系讲一点新闻史方面的专题,1953年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任教后,才正式地、系统地教新闻史的课。如果从1951年算起,到今年已经61个年头了。我现在不上课了,只还做些带新闻史方向的博士生的工作,可以说一辈子都在跟新闻史打交道。那就跟大家先聊一聊我所经历的这60年来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简单情况吧。

新中国新闻史研究与教学的第一个30年

这60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和教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那30年,包括“文革”前的17年、“文革”中的10年和缓冲时期的两三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高等学校的新闻系一直都设有新闻史课程,像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新闻史课程是安排两个学期,每学期两个学分,共4个学分。那时新闻史研究和教学的重点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新闻事业的历史,这恰好是新中国成立前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缺口。例如,戈公振编写的《中国报学史》,从先秦两汉一直梳理到1927年,非常详尽,但唯独对共产党的报刊介绍得比较少,一共不过两三行、仅仅几百个字——其中提到了《向导》《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但都只是一笔

带过。当时白色恐怖刚刚开始，戈公振不便对共产党的报刊多做介绍，是可以理解的。他本人去过欧洲各国，也到过苏联，思想其实还是很进步的，只是当时不便充分展开而已。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一样，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所有新闻史著作，对共产党的报刊历史大都很少提及，这成为那一时期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缺失。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在新闻院系开设新闻史课程的时候，首先需要恶补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这一段历史。当时没有多少参考书，只有胡乔木的那本《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可以借鉴，于是我讲课时就从这本党史中寻找线索、材料，从而勾画出了革命报刊史的一个简单轮廓。比如，在讲《湘江评论》的有关情况时，我找到北大图书馆的向达馆长，经他特批，看到了原件，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才勾画出来的。向达非常支持这项工作，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西域史专家、中西交通史专家，唐朝的那份“进奏院状”就是他最早（在中国学者中）在大英博物馆看到的，是他为中国新闻史研究者提供了这一线索，才促成了学者们对唐朝“进奏院状”在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的。遗憾的是，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很早就去世了。

总之，那个时代新闻史教学和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刊史，也就是近现当代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报纸。当然，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包括古代报纸和近代报纸，这些内容也讲，但基本上是一笔带过的。1954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组织编写了一部《中国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由丁树奇、李龙牧、黄河、刘爱芝四位专家合作完成。后来，丁树奇和李龙牧去了复旦大学教书，黄河和刘爱芝到了人民大学教书，新闻史研究和教学的力量主要分布在这两所大学。接着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编写出版了《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报刊史讲义》。这两部讲义，当时只在

两校内部发行，供新闻史课程教学使用，都是仿照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翻译过来的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苏共新闻史讲义的模式编写出来的。当时的背景是，中国内地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新闻史学界同样如此，连续翻译、出版《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苏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学教学大纲》等教材和文件数十种。苏联的那部讲义以联共党史为纲，基本反映的是列宁、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观点，不论是新闻理论还是新闻史，其内容和格局都与联共党史保持一致。因此，新闻史同党史和政治思想史的内容有很多重复，往往用写党史的方式写新闻史。例如，第一章写《真理报》为了什么而斗争，接下来一章便写《真理报》为另一个什么什么而斗争。在“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的时代风潮中，1956 年由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编写的那部《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用的也是这个模式。

1958 年我离开北大，随着北大新闻学专业整个建制并入人大新闻系，1972 年又调回北大中文系新闻学专业，1978 年再次回到人大新闻系。在改革开放之前的 30 年，新闻史研究大体可以说是这样一个状况：“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一抓紧，有关新闻史的文章便在业务刊物上销声匿迹；一旦那根弦松了一点，强调休养生息和调整了，业务刊物上就又开始出现新闻史的文章。只要有新闻史的文章出现，那说明整个社会大环境相对宽松了。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30 年的社会环境，整体而言是以“阶级斗争”为基调的。新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共新闻事业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报刊史。当“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的时候，连这方面的新闻史研究也会受到影响。1960 年人民大学新闻系在当时的系党总支的领导下曾经发动过一次非常“左”的学术大批判活动，“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记者是社会的活动家”“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进步报刊和革命报刊，与旧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进步报刊和革命报刊有历史上的传承关系”等观点都被否定了。毛泽东称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还说“我们这些人都都是他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不正是看到了历史上的这种传承关系吗？其实，列宁在谈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办报活动时，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这些观点在 1960 年的那次学术批判运动中都受到了粗暴的批判，认为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与历史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办报活动没有任何继承关系，即使是抽象地继承或批判性地继承也不可以，历史被完全割断了，新闻史研究遭到了重创。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更是几乎全面否定了。所有近当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上著名的报刊活动家基本上都“马尾巴拴豆腐——提不起来”了：陈独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成了“叛徒”，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通通不能提，最后，只剩下一位“贤人”毛泽东，和一位“圣人”鲁迅了。“文革”中，我什么事也不能干，只能老老实实地受批判，当“牛鬼蛇神”，住牛棚。我最近把那段时期残存的部分日记，录入电脑，发给几位年轻的老师看过。当时不少人贴我的大字报，其中一张批的是我写的一篇介绍《大江报》的文章。《大江报》在辛亥革命前有一篇著名的短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那张大字报就指着这篇短评说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鼓动在新中国制造大乱，是鼓吹反革命，而且是武装反革命。另外一张则直指我写的一篇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禁锢言论出版活动的文章，是在影射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当时还批过我写的一篇介绍邵飘萍的文章。邵飘萍在“文革”中被指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他 1925 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的事，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才被公开的，当时并不为公众所知晓。毛主席在和斯诺的谈话中也称他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那张大字报因此批判我写的那篇文章是在